



香港中文大學
基督教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Christi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第16-17期
2012年11月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基督教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樓
電話：39438155 傳真：26037659
電郵：centre-c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heology/ccs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地址：香港沙田崇基學院神學樓
電話：27703310 傳真：26037659
電郵：info@cscrc.org 網址：www.cscrc.org
2012年11月第29-30期

誠信持守 遭摧彌堅

祝賀《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出版發行

姚民權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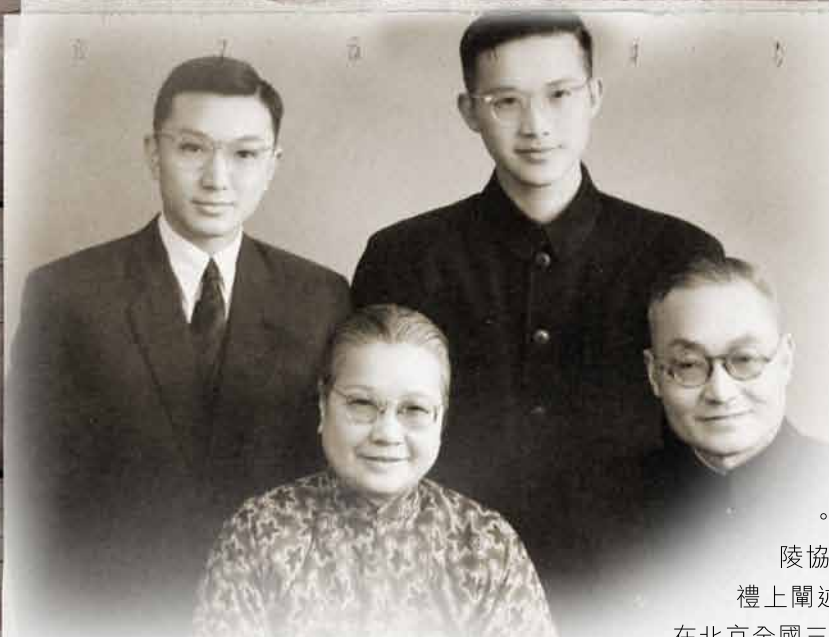
編者按：姚民權牧師，1930年出生，1948年至1952年就讀於南京金陵神學院。畢業後調至上海衛理公會景林堂（今景靈堂）工作。期間積極參加三自，是「小青工」（上海基督教青年工作團契）的積極成員。1958年聯合禮拜後，仍為虹口區牧師。文革後，姚牧師一方面在景靈堂工作，並於上海華東神學院任教，另方面又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著作包括：《上海基督教史》、《中國基督教簡史》（與羅偉虹合著）及論文多篇。現已退休。

本文是姚牧師對往事的珍貴回憶，從這些鮮為人知的往事點滴中，可讓我們對五、六十年代中國教會的歷史，以及吳耀宗與三自間的關係，有更全面的認識。

今年（2012年）1月17日張化、段琦兩位同事來我家看我，她們常與我談論一些宗教問題，例如：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受命編撰《上海宗教志》，那時張化在上海市宗教事務局，她就給我許多具體的幫助。此後她去上海市委統戰部，卻又從事耶穌教自立會俞國楨等學術方面的研究，發表論文、著作等。段琦在中國社會科學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可以說是我的老師，老家又在上海，每年來上海總必來我家贈我她的著述，還交換一些問題的看法。2007年夏她與我還一同應邀去香港出席《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周年紀念暨第五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大家看法很接近。17日她們希望我介紹吳耀宗生前的一些儀態、生活談吐等生動事蹟。張化還特將去年夏天香港舉行的「吳耀宗與中國基督教」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帶來贈我，我一方面佩服香港方面出版之快速，另一方面我也趁此重新瞭解吳先

* 邢福增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1。



吳耀宗（前排右一）、夫人楊素蘭與兩名兒子

生的生平。這次張化贈我的研討會論文集，有關論文作者除上述兩位外，還有許開明、王艾明、羅偉虹、嚴錫禹等，都是我在大陸和香港熟悉的同工，他們這次都用較現代的觀點來分析研究吳耀宗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信仰、思想，對我都很有幫助。尤其吳宗素同工提供了吳耀宗在領導「三自運動」後的遭遇，卻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的實際情況，有的甚至令我們震驚。我願意在此再提供一些我接觸的事例，以此說明吳先生在二十世紀57、58年後的確是被「架空」了。原以為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教會連遭挫折，信徒、教牧人員受折磨都是吳先生應該負責的，吳宗素的文章確實使我們頓釋迷惑。

先要說說吳先生、「三自」跟我的接觸。1953年頭我調來上海昆山路景靈堂工作，這期間得丁光訓主教在衛理公會會督江長川面前的推薦，所以工作很順利也很「順心」。1954年夏，丁主教又介紹我女友吳亦儂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任宗教部幹事。她初來上海，就借住在當時女青年會宗教部幹事黃堅如家，因黃堅如調去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後來黃堅如與神學院同工趙志恩結婚。吳亦儂此時吃飯就搭夥在同樓的國際禮拜堂協理牧師楊安鼎家中，直至1955年我們結婚。總之這些同工都較親切。我們不僅都參加上海基督教「青工團契」一青年工作者團契，

還被當時三自領導招收加入了一個半公開的核心——「小青工」，人數約二十多人，主要是三自機構中的男、女青年會員，不定期開會，討論政治學習中產生的問題，後來演變成階級鬥爭中的力量。因此我來上海後，開頭幾年很順心。後來教會出現55年、56年的王明道問題和倪柝聲問題，我都積極投入「鬥爭」。

。1952年秋，吳耀宗來南京主持金陵協和神學院的合併典禮，在開學典禮上闡述他重視教會建設；1956年春他在北京全國三自會議上提出「三大見證、十項任務」報告，都是我親耳聽聞的好報告，令人興奮鼓舞，覺得三自運動確實是使中國教會健康成長。（1952年秋我被留校工作，1956年春「三自領導」要我和張文博同去北京幫忙做會議記錄，所以有幸親自聽到報告，並對吳先生留下的印象極好。）可是不久，做禮拜的信徒急劇減少，不僅如此，教會同工中不少人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尤其1957年底及1958年底上海基督教舉行了兩次教牧人員的反右鬥爭。每次要學習半年多。我在1957年冬的「小青工」會上提問李儲文，「三自」為什麼不扣賈玉銘、竺規身的帽子，若如此我們教會工作也容易多了。沒想到下一次「小青工」開會時我即遭到尹襄、沈德溶的批判。幸而我趕快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聯繫思想狠批自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自思想」，才逃脫了這一關。1958年第二批反右鬥爭時，我仍被「市三自」看中，要我與任鍾祥擔任基督徒聚會處的正、副小組長。1959年反右結束後「三自」留我參加上海基督教的聯合禮拜，教會從208所減為23所，我妻子也轉業入木器雕刻廠做工人，我仍為虹口區的牧師，從此以後我在三自領導下不敢輕鬆從事。

聯合禮拜後，廣東人做禮拜的原嶺南堂總堂在虹口區，所以有時派我去武進路廣東人禮拜堂講道，多半時間能看到吳耀宗與夫人楊素蘭兩位來堂禮拜，吳先生除了必要與熟悉者打招呼外，

很少與信徒「交通」，做完禮拜就靜靜回府，給人一副厚道虔誠的儀態。這幾年中，逐漸覺得吳耀宗先生的虔誠信仰（神學觀點當作別論）與某些激進派三自有所不同，又看到吳耀宗的好友陳崇桂、張仕章和吳先生的兒子都被扣為右派，也開始知道當右派的嚴重性。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因為經常聽到傳道人是剝削階級，要脫胎換骨改造自己。1966年初，上海三自組織教牧人員參加「四清」時我就不報名，而是要求轉業；有空就去乍浦路橋頭，幫忙推三輪貨車上橋。不料「五一六通知」下來，三自通知我仍要參加「文革」，所以1966年我就被點名參加，當時小組長是李儲文的夫人章潤媛。從此我在小組學習地點青年會看到紅衛兵造反派的興起，看到教牧人員如何被勒令、被逼交代問題、受衝擊。我看到江文漢、陳維新等青年會人站在小圓桌上被批鬥，吳先生好像沒有參加。三個月後各自又回區裡，受各區宗教科不同的衝擊，像我們虹口區就有三、四個月不發工資，凍結私人存款，我還被勒令搬家。到1967年轉入下海廟與僧尼一同糊紙盒維生。1969年秋天市裡成立「毛澤東思想小分隊」，我們又被叫回市裡，地點在香港路原銀行公會，接受「毛澤東思想小分隊」對我們進行階級清理。那時我們教牧人員就進行揭發、交代，我在開頭幾天就因交代清楚被小分隊定為副小組長，與黃浦區的俞明

儉分別在小分隊裘同志領導下、進行了二年半的文革清隊學習。這段時期，社會上的紅衛兵形勢已退色，毛澤東思想工宣隊正盛，我在工宣隊小分隊領導下進行清隊（實質是交代、揭發）。我看到解放前組織基督徒民主研究會的徐國懋、孫瑞璜、王國秀等也在場，也得知文革後涂羽卿、吳高梓、鄭建業、謝頌三等仍被關押。吳耀宗也偶爾被叫回來「觸靈魂」，也看到地上有小堆抄家物資，其中有吳耀宗的瓷瓶等。另外李儲文、施如璋、羅冠宗、沈德溶、尹襄等青年會人，他們既不參加小組，也無交代被批鬥等情。我那時才知道吳耀宗與我們教牧人員一樣性質，才對他產生同情之心。

兩年半的「文革清隊學習」中，有一次全體開批鬥會，吳耀宗也被叫回來「觸靈魂」。批鬥中，小分隊長裘靈甫忽然責問吳耀宗：「你搞基督教幾十年，結果藏污納垢，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揪出了多少壞人壞事。吳耀宗你倒說說看，到底是你基督教聖經偉大，還是毛澤東思想偉大？」我一聽這刁鑽促狹的問題，心頭一怔，吳耀宗要麼痛遭責罵，要麼聲譽全毀。只見吳耀宗挪開了托著腦袋的手（他大概身體不適），坐正清清喉音，輕輕說道：「宏文四卷，指導世界革命，我每天認真學習，很有幫助。但對我個人



信仰而言，我覺得聖經更偉大」。小分隊頭目結果討了個沒趣，又不能自擬「打倒吳耀宗」的口號，只能振臂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來結束這場唇槍舌劍的較量。我作為副小組長，並列前排，清楚聽到吳先生智慧地回答了裘靈甫惡劣的陷害挑釁，勇敢見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事讓我印象深刻。

話分兩頭，吳宗素寫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電腦列印稿，在去年（2011年下半年）有位同工轉交給我，上面還附有一張小紙條「交姚民權牧師」。我看了電腦列印稿，才知道吳宗素在香港揭開了吳耀宗被架空的內幕。當看到其中引用我寫的一段文字時，我就在我的文稿中查到〈基督福音的勇士〉一文。那是一篇退稿。原來1993年全國三自為要紀念吳耀宗誕辰100周年，羅冠宗向我約稿，我憑自己對吳先生有限的幾次接觸，就寫成了那篇讚揚文稿。

幾星期後羅先生叫我到他在市政協的辦公室

（那時他任市政協秘長），在我的稿子上有四、五處他用鉛筆注的意見，問我文章中的資訊是那裡的，是誰提供的，有的鉛筆注還有他簽的「羅」字，我為保護我的好友（當時楊安鼎還沒出國，沈以藩還在世）而沒有正面回答。我就表示「不合適，退給我可也」。所以這文章還留在我的舊文稿中。今年3月份邢福增來上海看我，瞭解關於〈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中我那段文字，我答應找出舊文稿〈基督福音的勇士〉複印後寄往香港中文大學。幾天後我便遮掉羅冠宗的鉛筆注，將舊稿複印寄給了邢福增教授。

今年(2012年)1月我又閱看了張化給我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其中附錄吳宗素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比去年我得到同一題目的列印稿更為詳實。至於我讚揚吳耀宗智鬥小分隊的那件事，他提說乃出自我寫的〈大形無象，大聲稀音〉一文（見《大時代的宗教信仰》第590頁）。近二十年過去，我記得我寫過此題目，但記不起發表在何處，又無存稿，只有請吳宗素先生示我。

文革清隊中，鄭建業主教在我小組內被批鬥，我也感到納悶。1966年夏天我們基督教工作人員都在青年會參加初起的「文革」，三個月後大家各自回區。虹口區同工到和平公園掃地勞動，一次聽說鄭建業、沈以藩兩人因搞不通「文革受衝擊」，兩人不約



而同地各自到北京「上訪」，（當時「文革」中央允許大家到「毛澤東司令部上訪」，弄清「文革」意義），誰知在北京一無收穫，回上海後被造反隊以不服造反為名，被抓關押。當時的報紙上還登了人民廣場批鬥鄭、沈的消息。我們虹口區的同工也都乘機止步傾聽公園高音喇叭廣播人民廣場批鬥現場情況。此後風聲日緊，對此也斷了音訊。1969年「文革清隊」中，鄭建業仍被關押。他在我們聖公會、衛理公會小組。大家白天交代、揭發，晚上有時小分隊通知加班批鬥。有一天（大約1970年下半年）小分隊通知晚上批鬥鄭建業，還要我6時至7時吃晚飯時看守。我平時看見每晨讀毛選時，鄭總是認真談體會，頭頭是道。1958年上海反右派時，施如璋與鄭為第二期學習班正、副班主任。平時聽尹襄說：「鄭建業思想嚴密，一個簡單問題，他能說上一大堆；給他一個複雜問題，他能三言兩句說得大家服貼。」我就明白為什麼解放初他回國來，吳耀宗要他擔任《天風》主編，後來才是沈德溶與尹襄任正、副主編。我對鄭較有好感，那天我先吃了晚飯，看他邊啃饅頭邊落筆紙上。我還以為是「上訪」闖的禍。因小組內無別人，我就悄悄問他：「你是青年會來的，家中又有進步背景（我曾聽說他父親鄭和甫主教和他兄弟解放前就與共產黨有往來），怎麼被關押到現在。」他告訴我，是他自己不好，從《天風》下來後就去他父親鄭和甫主教的河南教會搞整頓，結果違反了省裡的意圖，所以1955年回滬就一直背時。我聽了似懂非懂。那天晚上批鬥會，突然來了李壽葆、施如璋、尹襄、羅冠宗、沈德溶等平時不下小組的大員，他們追問他：「解放前你與你父親剛在加拿大，怎麼一解放就回國了，到底帝國主義給你們什麼陰謀？」；「剛解放的國慶日，鄭和甫為何馬上通電擁護共產黨新中國？」；「你在鄭和甫的教區裡整頓什麼，有什麼企圖？」鄭建業用認

罪態度回答：「我有一個哥哥參加中國共產黨，是託派」；「我們是擁護新中國而回來」；「吳耀宗要我回國奪回《天風》」。我是越來越不明白是非，鄭建業經過批鬥後，總算放回家了。其後有一次小分隊要我去萬航渡路主教院看看他，看他家被抄後空空如也，他坐了一個矮凳上，用洗衣板背面作為寫「交代」的桌子。我回來如實彙報，也不敢多問。那晚，「上訪」的事小分隊一問也不問，批鬥鄭建業恐怕與「上訪」無關。現在猜想那時對宗教是「促進宗教消亡」（有位有名女傳道陳惠珍在學習班吃飯時偷偷禱告，大會就公開責罵她）。在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方針是純潔教會，鄭建業會否因為整頓教會而遭批鬥？其實它與當時抗美援朝控訴帝國主義同一個步調，但整頓教會在「文革」中當然會被批鬥。

1966年夏，文革初期，我在青年會學習班，有群眾大字報責問吳耀宗：「吳耀宗，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問你，你的上帝現在不靈了，你為什麼封鎖這最高指示？」這大字報我也看到。當時用舊報紙寫的大字報從天花板一張接一張直掛到地板，這是最底下的一張，我一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吃午飯時悄悄告訴了楊安鼎。待到下午去看，這一張大字報竟消失了，我想這是「防擴散」的，所以一直不敢提。直到2008年我去拜訪須啟道牧師，他與我的住處僅隔幾步，我知道他家中有一家庭禮拜。那天，他告訴我這大字報他也看到，是浸會書局編輯任大齡寫的，後來就被撤去了。我們估計發動群眾寫大字報揭發，實際是有人「遙控」的，現在揭露誰「遙控」也沒意思了。但可見丁主教在八十年代所揭露的滅教路線，原來這路線是有來頭的。

1970年下半年以後，我們從此沒有再見到吳耀宗，我從「文革清隊」回虹口區後，不久毛澤東思想小分隊把我們（主要是徐匯區教牧和部分「小青工」）介紹進了徐匯區的國營中國鐘廠，在那裡一、二年後我們還跟一般工人一樣，被評了每月60元的工資，也拿到了工會會員證，我的境遇改善許多。直到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文革」結束，中央提出新時期，結束階級鬥爭路

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79年9月2日慕爾堂恢復禮拜。可惜吳先生因病未能參加復堂禮拜。我願意再講兩件我親聞的事：一為1974年初夏的事，那時我住鴻德堂牧師住宅。張心田是1958年虹口區聯合禮拜主席，是一進步份子，吳耀宗發起三自運動，就要建立三自工作人員的人選，曾於1951年冬在上海組織過小規模三自幹部學習班（可見《天風》消息欄）。張就參加為學員。文革衝擊中我被逼搬出景靈堂牧師住宅，即與張心田同住一樓房，合用一間廚房，我們兩人私下談話。有一天我從中國鐘廠下班回家，他告訴我，下午他在四川北路附近遇到了吳耀宗，向吳打招呼，吳也不迴避他，兩人在馬路上談到文化大革命，還有「鬥、批、改」三個階段，文革還是要講宗教政策的，吳先生勸他忍耐等候「鬥批改」。張心田很起勁，跟我在廚房內詳述了「巧遇吳耀宗」一幕。我也是相隔數年，平時不通教會資訊，他竟能親見吳耀宗。另一事是相隔數年，大概1978年，我得知楊安鼎在南市區一陽傘廠加工做傘柄，一日他來告訴我，中央派人去見

吳耀宗，講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木牌，原掛在圓明園路169號，文革時被紅衛兵砸下，現在「文革」結束，中央希望基督教重新把它掛上，並派人值班。吳耀宗卻堅決回答：「先要恢復禮拜，宗教活動恢復了，我才同意掛牌子」。楊安鼎告訴我，他是從吳宗素那裡得知這事，他們都是中華基督教會一同加入宗派（他跟吳宗素還是「燕京」同學），我也確信這事，並告訴了張心田。我和張心田認為吳耀宗不同於李壽葆等青年會新興三自派，也所以日漸有吳耀宗被「架空」的想法。

我同意吳宗素最後說的，「吳耀宗是個悲劇人物」，去年有人請洪侶明（沈以藩夫人）交給我的電腦列印稿，我即傳閱給張天倫和王申明兩位，因為他們的父親張心田、王彼得雖都已歸天，但他們有時和我參加虹口區政協活動，我們談話比較投契。說到王彼得，他是1958年虹口區靈糧堂的牧師，他被戴「右派」帽子後，在市三自組織的「三自加工廠」包「仁丹」勞動，不歸虹口區教會管。1979年虹口區「文革」結束後也



恢復了禮拜。大概過了約一、二年虹口需要教牧人員，張心田要我動員王彼得回教會來領禮拜。我去王彼得家勸說他上講台，誰知道他告訴我，他的「右派」帽子還未摘掉。我和張心田都大吃一驚，趕快請示尹襄。她也不清楚，再請示市宗教局，宗教局就同意宣佈「合法平反」，又恢復工資等。王彼得原來在瀋陽，是中華基督教會東北大會的主席，反蘇反共的話講不少，1948年逃解放來上海，被趙世光看中，請他在虹口主持靈糧堂。1958年聯合禮拜，該堂在虹口區合併。

「反右」時王彼得成了右派，在三自加工廠被監督勞動。文革初，我在虹口公園和下海廟勞動，每次學習他總是說：「我是可恥右派……」（從不提具體「罪行」）。我知道他是「死老虎」，後來我去中國鐘廠，也不管這事。上海「三自」該管此事，誰知直到「文革」結束後也始終沒人管，所以到1980年王彼得還戴著右派帽子。可見市三自的負責人到「文革」結束了，他們連手下還有誰是「右派」也沒人過問，自己保命要緊。同工的政治生命「若艾草菅然」。如今張心田、王彼得都已去世，我還把他們的兒子看為我的知

心人，吳宗素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列印稿我也給他們看了，讓他們知道教會幾十年是受「左」的路線殘害的，它不是吳耀宗的本意，他們看過後，其中一位還勸我「你自己要當心，『左』的勢力還在」。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是張化同志送我的，我知道全國兩會和上海兩會看到這書的人不多，今年3月底我向邢福增教授反映過。我也答應我會寫一篇文章，內容關於我感受到「左」的迫害。但因我肢體不便寫作，所以此文作為我的「反左」文章，也是作為對吳宗素文章的回應。2007年吳耀宗墓遷葬上海後，我每年總和個別同工或家屬去福壽園掃墓。2010年、2012年《天風》登載華東神學院有人自發地去掃墓，可是他們也不知道吳宗素的文章。

可惜現在年輕同工都不太瞭解文革前後的三自運動和吳耀宗的生平，我還是祝賀《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出版。我正把該書傳給我的好友，相信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是愈來愈好，請吳宗素同工也存這個心，世界才會變得和諧。我們彼此代禱。■

